

大国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从2014年起，习近平在多个场合提到“修昔底德陷阱”。在与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多次会期中，两国元首也共同谈到这一话题。

这一话题为何如此受到习近平的重视？它的内涵是什么？中美两国如何避免这一陷阱？

本报记者 申孟哲

修昔底德陷阱是什么？

2014年1月，美国《赫芬顿邮报》子报《世界邮报》创刊号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发布。在这份创刊号上，有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访。

当时，世界上有这样一种论调：“中国迅速崛起后，必将与美国、日本等传统强国发生冲突。”

针对这种担忧，习近平在专访中说：“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

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

这一概念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他看来，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者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的矛盾冲突，多以战争告终。在巨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修昔底德以雅典和斯巴达的战争为例，在当时的“崛起大国”雅典领头的提洛同盟与“守成大国”斯巴达领导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之间，最终爆发的战争持续了27年，以斯巴达获胜告



太平洋足够宽阔

如果单纯按照修昔底德的逻辑，中美之间确实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关口——世界上排名前两位的经济体，一个是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一个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都在世界事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按照保守主义者的思维，中美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对抗、摩擦、猜忌，也为“修昔底德陷阱”提供了担忧的可能。

但事实上，中国不是雅典，美国也不是斯巴达。如习近平所言，宽阔的太平洋，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中美都面临时代赋予的机遇，中国的崛起不意味着美国的终结。

一方面，当今亚太是全球经济发展速度最快、潜力最大、合作最活跃的地区，也是中美利益交织最密集、互动最频繁的地区；另一方面，亚太也面临各种挑战，一些经济体复苏脆弱，各类安全威胁依然存在。促进亚太和平稳定繁荣，是中美两国的重要使命，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愿望。亚太应该成为中美加强协调和配合的合作社，而不应该成为中美互相角力的角斗场。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国强必霸”不是中国发展的逻辑，这一点，中国历代领导人都反复说过。就中国的记忆而言，近现代以来的惨痛战争史，让中国人更加珍视和平，也明白发展才是中国的第一要务。中国追求的“中国梦”，和闻名世界的“美国梦”之间，也存在着共通的空间。

前文已经说到，落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大国，大多数是因为战略误判。在这种误判中，信息的不对称、双方的不信任，可能会促使局势一步步升级，从遏制、制约逐步到军备竞争、摩擦对抗甚至是战争。

而看待中美关系，要看大局，不能只盯着两国之间的分歧，正所谓“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中美两国经济总量占世界1/3、人口占世界1/4、贸易总量占世界1/5。这两个“大块头”不合作，世界会怎样？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度之往事，验之来事，参之平素，可则决之。”要跳出修昔底德陷阱，习近平给出的答案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什么是新型大国关系？答案就是，建立“不冲突不

转，也使得整个希腊由盛转衰。

“雅典的崛起以及斯巴达对于雅典崛起的担心，使得战争无法避免。”修昔底德总结说。

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修昔底德陷阱几乎已经被视为国际关系的“铁律”。根据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首任院长格拉汉姆·阿里森(Graham Allison)的研究，从16世纪上半叶到现在的近500年间，在16组有关“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案例中，其中有12组陷入了战争之中，只有4组成功逃脱了“修昔底德陷阱”。

而落入陷阱的例子不可胜数：19世纪末的德国和英国，20世纪发展起来的日本，最终都引发了大规模的战争甚至是世界大战。

因此，在格拉汉姆·阿里森眼中，如果从历史上看，中国作为当今世界的崛起大国与作为守成大国的美国之间的战争似乎“难以避免”。

但是习近平显然不这么看。2015年9月22日，在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出席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宴会时，习近平发表演讲说：“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也就是说，大国之间的战略误判，以及由此引发的猜疑、威胁和反威胁，才是大国之间一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根本原因。而要跳出这个陷阱，显然就要从这方面做文章。

这是习近平第二次在公开场合谈到修昔底德陷阱。之后，在访美的行程中，他有两次谈到这一陷阱，一次是在与奥巴马总统会面时，一次是在会见美国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领导人时。

比如，在经济上，现在，中美双边贸易额已达5551亿美元，中国企业在美直接投资遍布美国45个州；两国之间，每17分钟就有一个航班起降，平均每天1.2万人来往于中美之间。两国在对方国家的留学生总数已逾50万。

根据专业预测，2022年，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进口国，中美两国也有望成为彼此最大贸易伙伴。到那时，美国对华的出口将超过5300亿美元，产生超过334万个工作岗位。

而在国际事务和世界治理方面，中国和美国也在联手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伊朗核问题、朝核六方会谈、南苏丹、阿富汗、中东等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都需要中美共同斡旋解决，气候变化、反恐、维和、减贫与发展等几乎所有全球性挑战也需要中美共同应对。

中美两国之间确实存在一些分歧，但从中美关系的全局把握，两国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双方合作始终是主流。如习近平所言，“中美两国合作好了，可以为世界稳定的压舱石、世界和平的助推器。”

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大国关系”。

2015年9月22日，习近平说，在这方面，中美应该做好这样几件事：“第一，正确判断彼此战略意图。同美方一道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实现双方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是中国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我们愿同美方加深对彼此战略走向、发展道路的了解，多一些理解、少一些隔阂，多一些信任、少一些猜忌，防止战略误判。我们要坚持以事实为依据，防止三人成虎，也不疑邻盗斧，不能戴着有色眼镜观察对方。”

两天后，在与奥巴马会面时，习近平进一步提出，下一阶段，双方应该继续加强高层交往，积极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加强舆论引导，保持中美关系发展良好势头，并为今后更长时期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奥巴马也表示了类似的观点：“我不认同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必将发生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大国尤其是美中之间更要尽量避免冲突。我相信美中两国有能力管控好分歧。美中之间的竞争应该是建设性的、具有积极意义的。”

中国最关心的“两大陷阱”

研读大量资料不难发现，如何避免落入“两大陷阱”，是中国和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当前的重要关切。

“两大陷阱”，即对外要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就是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必然对抗冲突，最后两败俱伤；对内要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所谓“拉美陷阱”，即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因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经济停滞。

在外部，情理之中，外界对中国“块头大了”有一些担忧。这就需要中国做好有关阐释工作，讲清中国要走的是一条和平发展、和谐共生的道路。事实上，中国拒绝“国强必霸”的历史逻辑。中国的DNA是爱好和平的。中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建设者、维护者，无意挑战现有国际秩序。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希望用一种好的历史寓意来描绘当今的合作。中国倡导构建两种新型关系，即新型大国关系和新型国际关系。中国同美国共同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和其他大国的关系也适用这些原则。在更普遍意义上，中国致力于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只要中国坚持按照既定政策做下去，相信朋友会越来越多，分歧能够降低到最低限度。

在内部，发展仍是中国第一要务，中国要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把13亿人的事情做好，就是中国对人类最大的贡献。针对“中等收入陷阱”，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十三五”规划的建议，非常有针对性。中国下一步就是要踏踏实实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第一个就是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中国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既要“把蛋糕”做大，也要“把蛋糕”分好。在“十三五”规划建议中，这一点体现得比较好。中国要补齐短板，并提出了具体的量化目标，即今后5年让7000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修昔底德陷阱”阴影之下，中国与他国，有矛盾可能是常态，但并不可怕，关键是要不断加强沟通，积累互信，扩大共识，共同构建亚洲和世界命运共同体。“中等收入陷阱”压力之下，中国在发展理念更新，经济结构转型，增长动力转换方面，也有大量的事要做。

关于这“两大陷阱”，习近平本人也有大量论述。今天，我们用两篇文章整理他的相关论断，以便各国读者理解中国的想法。对于未来，中国会努力把故事说好、说清楚，也希望世界能够予以理解。

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谈到为何使用这一概念，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因德米特·吉尔和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霍米·哈拉斯撰文表示，当时世界银行发现，对于亚洲中等收入经济体来说，还没有便于传播的发展战略。“经济决策者开始思考从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国家所需的经济增长来

这个说法最早出现于2006年世界银行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意思是，一个国家的

自何处。”

统计显示，人均国民收入达到3000美元以后，许多国家便陷入经济增长停滞期。按照世界银行的最新定义，低收入国家是指人均国民收入在824美元以下，中低收入国家是825美元至3254美元之间，中高收入国家是在3255美元至10064美元之间，高收入国家则超过10065美元。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介绍说，陷入“陷阱”的国家通常具有以下特征：既丧失了与低收入、低工资经济体在制造业方面的竞争优势，也没有能力同发达经济体在高新技术创新领域展开竞争，经济无法由依靠廉价劳动力或资源能源类自然禀赋向依靠高生产率导向的增长模式转变。

中国的现实担忧

“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发展。我们有信心在改革发展稳定之间以及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之间找到平衡点，使中国经济行稳致远。”2014年11月10日，习近平在北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同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对话会时说道。

尽管我们有跨越的信心，也必须正视跨越这一陷阱的难度。在今年4月的“清华中国经济高层讲坛”上，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就警告说，随着中国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未来存在着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他认为，如果能完成几次全会关于2020年之前设定的任务，我国将绕开这一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的威力早已为世人所知。

“当然我们有信心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是确实很难。”长期关注中国发展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分析说，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二

如何避免陷入这一陷阱，习近平在多个场合提出过一系列措施。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他提及最多的措施。在博鳌亚洲论坛、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接受外媒采访、在出席欢迎宴会等多个场合，习近平都阐释了这一理念。

这其中，既有机遇，也有方向。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即将出现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为我们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难得的重大机遇。而在今年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习近平则在《华尔街日报》表示，中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持续推进，居民储蓄率高，消费潜力巨大，人民工作勤奋，中等收入者比重在提高，服务业发展势头强劲，市场空间和潜力都很大，今后一个时期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有基础

如何跨越“陷阱”？

也有条件。

方向已定。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上就表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在此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在2014年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他要求加快全面深化改革步伐，推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同样是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他强调当下中国更加注重创新驱动，更加倚重消费拉动。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既需要方法论，亦需要时间表。

“未来五年，经济年均增速需要保持在6.5%以上，这意味着到2020年人均GDP将达到1.2万亿美元左右，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接近高收入国家水平，基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将是现代化进程中又一个里程碑。”11月24日，李克强总理在第五届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论坛上说。

中国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吗？

本报记者 刘少华

“我们对中国经济保持健康发展抱有信心。中国不会落入所谓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习近平多次谈到“中等收入陷阱”，也多次表达中国肯定能迈过去的信心。

“中等收入陷阱”有何为例，中国能否避免，中国如何避免？

何为“中等收入陷阱”？



如何跨越“陷阱”？